

# 消除风险还是制造冲突： 空巢家庭中的子代媒介干预与关系调适

刘娜，金一凡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深度介入空巢家庭，子与亲之间的媒介素养鸿沟推动了媒介干预模式的重塑，子代媒介干预逐渐发展为一种新型干预方式。子代在父母媒介使用中扮演着反哺者、监管者和限制者的角色。研究通过对空巢家庭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识别出子代根据不同风险感知而实施的温暖型干预、混合型干预和控制型干预。这些干预行为塑造了一种以社会融入为目标、以技术为基础、以风险管控为特征的媒介干预结构。与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代际合作和媒介赋能不同，文章揭示了子代媒介干预所引发的情感风险与权力冲突，展现了数字技术嵌入空巢家庭后的新矛盾，为探索双向沟通的理想干预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空巢家庭；智能手机；媒介干预；数字反哺；家庭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5) 01-0065-10

## 一、问题的提出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共有空巢老人家庭数量达 7819 万户，涉及约 1.2 亿空巢老人，占 60 岁以上人口的 45.1%。<sup>[1]</sup>与此同时，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53 亿。<sup>[2]</sup>我国正处在老龄化、空巢化和数字化共振的高风险期。<sup>[3]</sup>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对社会结构的深层次介入，“媒介化”成为理解当下社会运行机制、日常生活结构以及主体交往行为的重要视角。<sup>[4]</sup>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空巢中老年群体日益依赖数字媒介填补生活空白，但同时也带来了数字成瘾与健康下滑的双重风险。基于此，如何通过媒介干预维持家庭和谐并规避潜在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研究表明，信息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家庭生活节奏”。<sup>[5]</sup>从家庭视角重新审视媒介，可以发现其正逐渐从对社会和生活的叙述转向对家庭体验的重构，成为一种深入家庭的去结构化力

量。在此背景下，家庭成员间的物理分离不再成为交流的障碍，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在”提供了新的可能。尤其是在空巢家庭中，兼具陪伴和管控的技术功能——手机投屏，正逐渐融入家庭生活。投屏可以将两部手机暂时串联，用以帮助子代在数字空间中快速“回巢”，协助父母解决技术难题，识别数字陷阱。与父母媒介干预不同的是，子代媒介干预通过投屏等，搭建了子与亲之间新的互动方式和关系格局，正逐渐重塑媒介干预的理论视角。

然而，尽管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显著，现有研究尚未深入探讨子代媒介干预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家庭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前述媒介干预为理论背景，探讨空巢家庭中子代媒介干预的实现机制、现象表征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 二、文献综述

### (一) 家庭环境下媒介干预的研究

当论及媒介干预，学界更多谈起的是父母媒

介干预。所谓父母媒介干预指的是父母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技术策略对孩子接触的媒介及内容进行控制、监督和指导。<sup>[6]</sup> 如何正确引导儿童使用媒介, 将成瘾风险最小化, 成为当代父母关心的共同问题。<sup>[7]</sup> 有关父母媒介干预, 国内研究尚处在一个起步阶段, 更多是在媒介素养的框架下进行考察。<sup>[8]</sup> 有研究者将父母媒介干预划分为四种类型: 积极型干预、限制性干预、共同使用和监督四种类型。<sup>[9]</sup> 随后也有学者提出积极的共同使用以及拓展限制型干预, 包括技术型限制和互动型限制两类。<sup>[10]</sup> 此后, 研究不再局限于媒介干预的类型, 而是更多从父母媒介干预的动因或效果来开展。<sup>[11]</sup>

进入媒介化时代, 智能手机全面入侵儿童生活, 国内学者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下展开了有关父母媒介干预的研究。如郑春风发现以单一、威权为主的媒介干预加剧了儿童在空间、行为上的反抗。<sup>[12]</sup> 张箴对比了中国城乡父母的媒介干预策略以及内含的阶层差异化风险。<sup>[13]</sup> 在家庭视阈下, 父母单向的媒介干预方式被概括为“亲职监督”<sup>[14]</sup> 和“家长介入”<sup>[15]</sup>。随着新媒体对家庭生活的介入, 家庭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转移, 青年与父母开始出现双向社会化的关系。<sup>[16]</sup> 同时, 祖辈的介入使得媒介干预转变为三代人之间的关系互动。<sup>[17]</sup>

然而, 目前还没有研究探索空巢家庭内出现的子代媒介干预。实际上, 在中老年网民数量激增的同时, 其数字风险也在激增, 甚至预示了不断加深的数字鸿沟, 因为老年人可能难以在平台上导航, 或者更容易受到网络诈骗的影响。<sup>[18]</sup> 在空巢家庭中, 由于子女陪伴的缺位, 父母的手机使用无法得到及时纠偏, 其所产生的家庭损失, 往往会加剧家庭关系断裂的风险。子代有必要及时介入父母的媒介使用过程, 对其媒介使用行为进行进一步指导与纠偏。值得注意的是, 通过远程连接干预父母的媒介使用已经成为可能, 那么空巢家庭中子代媒介干预如何实现? 有何表征与影响?

## (二) 空巢家庭的媒介使用与数字反哺

随着中国社会化的深度转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跨区扎根, 划出与父母的地理边界, 空巢家庭逐渐成为社会转型的典型症候。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大量中老年人在生活质量提升的夙愿下开始“不得已”探索网络世界。<sup>[19]</sup> 然而, 目前学界主要关注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与心理健康。<sup>[20][21]</sup> 随着新媒介逐渐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养老资源, 媒介技术在减少老年人的社会孤立感、改善他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提高整体福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sup>[22]</sup> 短视频的“低门槛”, 让农村老人在抖音中获得了虚拟陪伴, 并伴有日常生活的公共性复苏。<sup>[23]</sup> 但若空巢老人只是利用短视频填充养老支持的极度匮乏, 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虚与沉迷成瘾的问题也不容忽视。<sup>[3]</sup>

当谈及空巢亲代的媒介使用问题之时, 必然需要回到数字反哺视角。数字反哺在数字代沟的背景下出现, 周裕琼等人提出了数字反哺的三个视角, 包括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sup>[24]</sup> 随着传统家庭模式的解体、空巢老人的增多, 本该由家庭承担的养老任务被抛向社会, 这也使得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的影响从家庭辐射到社会。<sup>[25]</sup> 然而, 只有在家庭范围内数字反哺才能真正落到实处。<sup>[24]</sup> 在微观家庭场域中, 数字反哺不仅作为一种最终目的, 还成为一种让家庭良性运转的基本范式。<sup>[26]</sup> 子代的反哺越深, 亲子关系则越和谐。<sup>[27][28]</sup> 过去数字反哺实现的前提是双方身体的在场, 随着连屏技术的成熟, 跨地区的移动反哺成为可能, 也逐渐成为家庭场域内实现子女远程介入的一种方式。

截至目前, 并没有研究将视角定位于空巢家庭中的亲子远程媒介互动, 虽有研究关注到了老年主动或被动的数字行为, 如流动老人家庭中的数字代理行为, 即流动老人通过他人访问互联网的代理形式<sup>[29]</sup>, 以及农村地区媒介反哺的持续性与反复性等<sup>[30]</sup>。但此类研究更多依旧将“身体在场”作为一种前提, 来考量他者如何干预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显然, 空巢家庭中亲代的媒介使

用离不开子代持续地干预。这意味着, 跨区域的数字反哺——尤其是移动智能技术对“远程媒介干预”的支持——尚未得到深入探讨。事实上, 数字反哺只是子代干预父母数字行为的一种形式, 移动智能技术则进一步拓展了子代对亲代进行远程干预的可能性, 形成了一种跨地域、跨屏幕的联动模式。移动智能技术为子女提供了机会, 通过协商、代理、控制和干预等方式影响父母的手机使用行为。基于此, 子代媒介干预反映了怎样的家庭结构和权力关系? 研究旨在通过一种过程性动态视角观察现代性背景下中国流动家庭的权力关系变化。

三、研究设计

研究从扩展组访谈展开, 并使用半结构方式。扩展组访谈法是为了研究处于远距离地理分布式家庭中的信息技术使用。<sup>[31]</sup> 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 扩展组访谈法采用了近年来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将访谈对象进一步细化, 并采用跨时空的方式展开。“扩展”属性是指: (1) 在访谈的同时辅以观察; (2) 将群体访谈扩展为一系列访谈, 以调查家庭成员不同的议程; (3) 可以选择通过电话或任何视频会议的模式进行访谈。

研究的访谈对象包括整个家庭。子代因工作迁出, 亲代长期生活在一个空巢状态, 子代成为亲代进入数字世界的帮助者。访谈前, 研究在湖北省 JS 县走访部分空巢家庭, 并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记录远程协助过程, 对子代的手机界面进行屏幕录制, 并同步在豆瓣小组“教爸妈玩手机”和小红书笔记中广泛征集研究对象。最终共有 7 个家庭 (详细家庭情况见表 1) 参与了研究, 14 个家庭成员接受了约 60 分钟的访谈, 并得到了 6 位访谈者的支持, 获得录屏和图片等经验材料。

研究数据分析与数据收集同时进行。在转录过程中将受访者参与干预以及被干预的经历等都纳入讨论。采用 Nvivo12 对数据进行组织和编码, 将主题提炼分离出来。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数据, 研究将每份田野笔记与访谈记录都进行了仔

细分析, 并邀请与研究无关的人员对编码结果进行检查。为了引出意义单元, 访谈中每一个语句, 甚至视频访谈中微弱的语气和表情均被纳入分析, 也就是说, 文字誊本的边缘都会被记录。通过提供研究过程的细节, 研究将最终编码结果发送给部分愿意参与的受访者, 以提供机会来审查这些主题, 确保一定的解释准确度。

表 1 受访家庭情况一览表

受访家庭编号	成员编号	受访者年龄	职业	使用平台	空巢时间
A	女儿 A1	31 岁	公司员工	向日葵、ToDesk	5 年
	母亲 A2	62 岁	下岗职工		
B	儿子 B1	32 岁	公司员工	小米通话 app	5 年
	母亲 B2	60 岁	农民		
C	女儿 C1	33 岁	自由职业	OPPO 手机设置	5 年
	父亲 C2	65 岁	下岗职工		
D	女儿 D1	30 岁	公务员	vivo 亲情模式	4 年
	母亲 D2	59 岁	个体户		
E	儿子 E1	32 岁	小学教师	OPPO 手机设置	7 年
	父亲 E2	68 岁	个体户		
F	女儿 F1	35 岁	公司员工	小米通话 app	6.5 年
	母亲 F2	63 岁	农民		

四、异地共连: 空巢家庭中子对亲的媒介干预层次类别

对初次接触手机的中老年人而言, 手机的多功能性易带来使用上的挫败。若子女无法及时帮助, 父母可能陷入数字陷阱, 甚至加剧技术上的相对剥夺感。子代通常早于父母产生风险感知, 影响父母的后续精神接入和使用方式。成长环境与文化差异使风险感知不同, 同时也导致不同的子代干预模式。

随着技术成熟, 远程连线 (Remote Access) 使跨地理访问成为可能, 这项企业级应用起初用于大型协作办公, 例如远程工作、IT 支持和远程服务器管理。现今, 远程连线技术逐步用于家庭需求, 尤其是在需要长期护理的情境中, 如远程医疗、长期护理中的虚拟探视。近年来, 诸如识

年、ToDesk 等手机应用，以及华为、小米等提供的亲情守护功能，也已将远程操控功能推向日常使用场景。借助远程连线，两部手机可以在同一时间串联，子代可以远距离操控父母的手机界面，积极介入父母的媒介使用，开展协助、监督与监测。在田野调查中，研究发现子女不同的风险感知会带来积极干预模式、限制与积极混合的干预模式，以及完全消极的干预模式，研究具体划分为：温暖型干预、混合型干预、控制型干预，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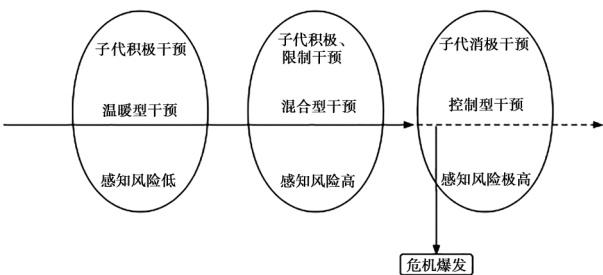


图 1 空巢家庭中子对亲媒介干预类型

(一) 寓教于屏：子对亲的温暖型干预

所谓“温暖型干预”，指的是子女在帮助父母使用智能手机时提供积极的正向支持，充当“温暖专家”的角色，即在亲密关系基础上为年长者提供技术支持的中介群体。<sup>[32]</sup> 此外，“数字反哺”也被视为积极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弥合代际数字素养差距，从而减少沟通隔阂。积极干预通过社交互动、共同使用和探讨的形式来引导年长者合理使用媒介。“温暖”不仅体现在具体行为上，也体现在子代对留守父母的态度中：子代坚信父母在其帮助下能够学习和掌握技能，熟练使用手机，对父母能力的高度信任使他们的风险感知偏低，从而在远程协助中为父母提供足够的支持。

在家庭 A 中，由于长期分居，A1 为母亲购买智能手机后，最初只能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集中解决其手机使用问题。母亲常抱怨软件更新频繁，功能位置变化。倘若仅靠电话指导，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精准定位。为更好协助母亲，A1 根据广告推荐下载了名为“向日葵”的手机应

用，并在回家时为母亲完成了设置，使双方通过同一账号登录后可进行远程操作。起初，A1 帮助母亲完成了字体调整、头像设置等基础操作，随后通过“远程连接+共同操作”引导母亲学习删除照片、清理内存、设置隐私等功能。A1 还协助母亲熟悉微信的分组、拉黑、删除等功能，为其提供了更便捷的支持。

“我妈用的是 vivo 手机，之前她就只会用来打电话、发语音，其实里面还有好多隐藏功能，都可以打开。我还经常帮我妈打开刘畊宏的直播间，一起跟着他跳操，算是监督了自己，也带着我妈一起变得更健康。”（A1）

“反正自从我女儿开始给我远程控制后，我基本上也快精通这个手机了，但是现在学得快，忘记得也快，所以有女儿在身边真好。”（A2）

此外，温暖型干预不仅限于技术指导、辅助或共同使用，还通过媒介的技术嵌入性延伸到对亲代的健康监测与关怀。D1 通过远程操控为母亲开启了 vivo 手机的健康监测功能，该功能一旦激活便能实时监测母亲的睡眠和心率。技术在此作为桥梁，缓解了子代对亲代健康的担忧，实现了“远在他乡，近在眼前”的关怀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空巢的家庭状态并不等同于情感上的空巢。子代和亲代的沟通不再只是“对空”言说，而是“对屏”互动。地理距离并未阻隔数字反哺，子代通过远程技术将听觉、视觉融入反哺过程，在屏幕上寓教于乐，利用跨空间的数字演示帮助亲代提升数字素养。在完成“物质接入”后，这种互动方式进一步增强了留守亲代对数字技术的信心和兴趣，为迈向“精神接入”创造了可能性，同时在远程连线中实现了数字技能的反哺，逐步达成“使用接入”与“技能接入”。对于身居异乡的子代而言，技术中介连接的健康数据也使其得以远程守护父母的身心健康。通过温暖专家的引导、远程反哺的介入、健康数据的监测，子代能够在手机中精细履行子女责任，弥补亲情的缺憾，担当媒介干预中的温暖支持者与教育者角色。



## (二) 制造和谐: 子对亲的混合型干预

并非所有家庭都能通过远程合作与父母建立和谐的数字关系。对于年龄较大的老年群体, 因世代背景和文化差异导致的数字分化, 其数字媒体使用多依赖家庭或社区支持。在我国, 老年人中仅有 52.1% 和 46.2% 分别能独立通过数字平台完成日常购物和信息查询, 几乎一半的老年人面对的并非数字赋能, 而是“数字负能”。<sup>[33]</sup> 在 AI 技术掩盖下, 数字陷阱日益隐蔽、复杂, 数字空间内诱导消费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相比之下, 子代的风险感知越高, 越倾向于采取限制性的媒介干预策略。

首先, 在父母媒介使用过程中, 子代通常采取积极共用与引导监督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其手机使用。协助父母使用手机成为子女数字孝道的一部分, 反映了传统孝道在数字空间的延续。多位受访者表示, 远程连线技术有效减少了以往“教了就忘、反复操作”的困扰, 使得协助父母更加便捷。在媒介素养上, 子女逐渐确立了家庭中的数字权威, 而父母则在新技术面前逐步失去话语权。父母对新技术既抱有好奇心, 又常表现出低自律性, 易产生依赖性。例如, E1 在访谈中说: “我爸特别喜欢刷短视频、看直播, 起初我觉得他用来打发时间也挺好的。前几个月他突然说眼睛啥也看不清了, 我才带他去检查眼睛, 不仅眼睛有了问题, 颈椎也出了问题。我看他手机才知道他整日地在玩, 我也不反对他玩, 但是从那以后, 我也开始管了。” (E1) 在此之后, E1 利用 OPPO 手机中的智能监测功能, 查看父亲的手机使用时间与频率, 并通过远程操控开启抖音的防沉迷系统。在监测的过程中, E1 采用提醒和劝阻的方式, 而非强制要求父亲停止使用手机, 以积极、温暖的方式引导其健康、有序地使用智能设备, 从而填补生活中的空虚感。

其次, 面对父母希望拓展社交的需求, 子代采取了一种“保守支持”模式, 将积极干预与限制相结合, 以平衡社交拓展与潜在风险之间的张力。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社交圈逐渐缩小, 并

因退休、丧偶和健康下降等原因更易感到孤独。为缓解这种空巢情绪, 留守老人常借助微信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来对抗孤独感。一方面, 在重建熟人关系时, 老年群体因乡土背景而渴望与旧友重新连接, 表现出积极的社交态度。子代鼓励留守父母在数字环境中维系熟人社交, 以弥补现实生活中关系的流失, 如协助父母设置头像、打造个人主页等。然而, 这种支持并非毫无保留, 子代也会适当提醒和监督。F1 曾通过远程连线发现其母亲与异地老友频繁联系, 便提醒母亲保持警惕, 强调当下许多诈骗可能源于熟人关系。

“我身边有同事就被熟人诈骗了几万块, 我妈人特别热心,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 对一些同村的人没啥戒备心, 现在好多人去打工了, 人也不在我们村, 这要是被骗了, 只怕人都找不到。所以我都让我妈留个心眼儿, 有人卖惨借钱的话不要信。” (F1)

另一方面, 当面对父母渴望拓展新的数字关系时, 子女会提醒父母不要随意透露私人信息。例如, E1 在远程检查父亲的抖音时发现其名称中包含详细的居住地信息。在被普及个人隐私的重要性后, E2 随即修改了个人简介和用户名。与此同时, 子女选择隐蔽地监测父母的社交活动, 在不干扰其正常社交的前提下, 监督他们的社交拓展行为, 对父母试图越界的行为予以设限, 以防父母陷入虚假网恋和过度消费。

“我就经常检查我妈的抖音等级, 如果一下子升级太多, 那一定又是给哪个主播刷了大礼物, 尤其是之前那个秀才, 专骗老人的钱, 我看到我妈还和他合拍作品了, 我跟我妈说了这种人信不得! 吓得我天天检查。” (D1)

面对网络诈骗、情感诱骗等网络陷阱, 子代普遍具有较高的风险感知, 智能手机对老年生活嵌入的同时也催生了子女新的数字空间义务。面对父母使用智能手机的不同诉求, 子代也采取了不同的干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于父母媒介干预中的强制干扰行为, 如禁止、破坏, 子代秉持着以和为主的混合干预模式, 在数字空间中

既引导父母正确使用手机,又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力图制造稳定的家庭秩序。

### (三) 风险应对:子对亲的消极控制干预

在部分赡养型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深度绑定让媒介干预显得愈发紧迫。有研究指出,在我国家庭小型化、迁移流动家庭化等变化趋势下,赡养型关系中的子女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其主动反哺意愿也最弱。<sup>[34]</sup>在此背景下,虽然子代反哺并未及时落实,但消极地控制干预并非常态,更多呈现为一种应对家庭危机的处理模式。简单来说,完全的消极不存在,更多只是一种子代对于父母“越轨”行为的极力抵抗。

首先,消极控制干预采用一种远程“切断”的方式来规避父母再次陷入网络陷阱。切断父母的移动支付是子女应对网络经济诈骗的粗暴方式之一,往往能有效化解风险。当F1发现母亲因为无法通关“开心消消乐”而频繁购买虚拟道具时,F2已经在游戏中花费了近2000元,即使子女千方百计预防诈骗,却未曾料到电子游戏的隐藏付费。B2也曾轻信视频宣传的天价“神药”,企图通过消费来还原青春。当家庭危机爆发后,子代会采取远程切断支付,即将消费权置于子女手中,来作为一种干预措施。如B2在此之后的任何消费需求都将预先告知B1,由B1购买后邮寄至家。子女在这里充当了亲代消费的中介力量,通过提前预审、代替支付的形式有效规避了家庭风险。

其次,媒介上瘾已经成为中老年无法自我治愈的“数字疾病”,子代通过阻隔人与技术的连接,来帮助亲代实现技术戒瘾,由此在系统性的约束下,让亲代的媒介使用行为逐渐回归理性。以往父母会因为“实在无法忍受子女玩手机的问题,而做出摔门、训斥、体罚、砸手机等极端行为”<sup>[12]</sup>,不可忽视的是,空巢家庭中的父母对于手机的着迷程度不亚于青少年,甚至在短视频所塑造的心流体验中忘却时间、淡漠交际。

“我妈现在每天还没起床就要打开抖音,整日地看,没完没了地刷,不仅搞得眼睛视力不

行,上一次还煮着玉米去看直播,结果锅都烧糊了,幸亏隔壁邻居提醒。”(D1)

子女陪伴的缺位让父母的手机戒瘾往往力不从心,D1多次使用微信文字、语音通话的方式劝导其母亲应多专注于现实生活,其母亲也多次表示无法经受手机的诱惑。在此之后,在D1的建议下,家庭内采用了一种无奈的消极干预,即严格控制手机使用时间,让手机实现自动开关机,D1也会偶尔在深夜时使用通话的方式,来检查母亲是否偷偷开机。

“无奈”一词在访谈中多次出现,使子代不得不采用消极控制,如使用“切断”“断连”等不得已的应对策略。当子代面临劝服失效、家庭损失等情况之时,便会采用切断消费、设置断连,将经济活动、精神活动予以限制、束缚,并伴有监督,来弱化风险。这也印证了手机所创设的道德实践,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风险防范。手机媒介社会化过程必然牵涉特定与具体的道德责任议题,在这些议题上,主体越来越需要为他们的媒介选择与实践行为负责。<sup>[12]</sup>因此,子女开始成为数字时代的媒介监护人,“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文化模式复刻在媒介场域中。

### 五、情境重构:空巢家庭中远程情感与权力的制造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不平等与排斥问题逐渐受到关注。智能手机的互联性不仅缓解了空巢家庭的隔阂,也为亲代的手机使用提供了安全保障。然而,这种干预深受子代态度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家庭内的权力关系并带来累积的情感风险,揭示了技术带来的悖论:技术不仅在弥合代际隔阂,也在不断生成新的家庭问题。

#### (一) 远程干预中不平等的情感风险

在空巢家庭中,子女的长期缺位加剧了父母的孤独,特别是在子女异地定居的情况下,空间隔离使得家庭情感维系面临危机,子女也因此产生管护焦虑。智能手机在此情境下成为一种“数字代偿”,其作为陪伴媒介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亲情的缺失。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物

质接入”优先于“精神接入”,子代期望手机填补父母的日常空闲时间,以缓解孤独和家庭危机。虚拟空间因具备“身体缺席”和“行动在场”特性,提供了多样化的交流方式,使远程连线成为子代与父母之间的一种新的情感和管护渠道。<sup>[12]</sup>一方面,远程连线技术作为一种技术补偿,通过媒介干预的方式融入家庭,特别是在子代风险意识提升的背景下,助力于缓解因诈骗隐患引发的家庭不安。定期的媒介教学往往因遗忘而失效,而远程技术不仅便于子代随时监控、引导父母使用智能设备,还为家庭场域带来了隐秘的“革命”,重新定义了情感维系与家庭生活的模式。<sup>[35]</sup>

另一方面,远程连线作为情感代偿机制构建了一个开放的沟通空间,但也强化了家庭中的不平等依附结构。在子代的远程干预中,父母作为“被教育者”和“被管理者”处于情感空间的弱势地位。调研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子代的数字干预通常是一种临时、偶发的应急干预,缺乏系统的数字反哺,且面对“教了就忘”的情况,子代往往直接“代劳”解决父母的问题,成为数字代理人。这种操作逐渐形成了父母对子代的依赖,建立了“任何问题子女都能解决”的依赖思维模式,反而加深了父母的数字弱势地位,扩大了数字鸿沟。例如,受访者B2在子代帮助后感到矛盾,既想借此机会多与子女进行交流,又担心频繁求助会干扰子女的正常生活,导致在技术问题面前产生复杂的情感拉扯。这一过程使得子代的干预形成了一种技术悖论:技术原意是为提升父母的数字素养、预防风险,但其结果却加重了父母对子代的依赖,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数字劣势。

更为重要的是,在远程干预中,无论是温暖型干预还是混合了积极与限制的干预模式都会在家庭危机的爆发下进入消极管控,进一步挤压良性互动的空间。如何更好地预防风险,而不是在危机爆发之后进一步激发家庭内部的情感风险,空巢家庭依然面临着现实与虚拟风险交织的复杂

局面。

## (二) 远程连接中的权力冲突

智能手机的普及重构了空巢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在数字空间中,子代逐渐取代长者,成为父母的“媒介监护人”,并构建出年轻化的话语体系。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表明,知识能够生产权力,而成熟的权力机制反过来规训知识,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和权力结构。<sup>[36]</sup>在中国家庭传统中,年长者掌握话语权,但在数字技术知识成为一种新型权力后,子代凭借其数字优势逐渐主导父母在网络空间的行为,甚至规定并监督父母的智能手机使用方式。远程连线作为一种技术干预手段,为年长父母提供了技术便利,使他们在子代的帮助下获得数字空间的参与感,并在家庭场域内追求代际权力的平衡。然而,这种以支持为表象的赋权虽试图缓解代际不平等,却也无意间加剧了新的依附关系,导致父母在数字空间中更深地依赖子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劣势地位。

数字参与中的不平等加剧家庭权力结构的倾斜。在数字互动中的不平等表现在留守父母对子代的时间安排和技术支持的高度依赖上。在被子代反复提醒数字陷阱的隐蔽性和潜在财产、名誉损失后,对数字世界的技术性恐惧使许多父母不敢尝试新事物。尽管子代在温暖型干预中积极协助亲代适应媒介使用,但这种干预往往是临时性的,并受制于子代的时间安排。例如,A2在回忆与女儿的远程连线时表示:“记性越来越差,我想学好用手机,但总不好意思打扰她,有时等到她忙完才敢发消息,即便很晚了。自己也可以摸索,但我只相信她,别人我不放心。有时想多聊几句,但她忙去了,心里其实有些失落。”此外,在面对技术风险和数字陷阱时,子代往往急于介入父母的媒介使用,以规避潜在风险。然而,这种干预隐含了数字参与中的不平等——即默认父母在技术上的“弱势”地位。长此以往,这种干预不仅未能弥合技术素养的差距,反而加深了父母在媒介使用中的自卑感,也增加了他们现实生



活中的孤独感。最终,这种出于关心的干预无意中产生了“负权”的效果,使父母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抗拒子代的技术介入。

家庭权力结构中单向的监控也加剧着不平等。在空巢家庭的媒介干预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通过单向监控显著加强。远程手机监控将父母置于被管理的地位,类似于智能家庭监控的模式,但其不仅限于日常生活,还渗透到父母的媒介行为中,对其观念、态度和行为进行引导。这种监控模式收集父母的身体状况、使用时间、设备类型和聊天记录等数据,通过平台反馈给子代,以期创造安全的技术使用环境。然而,单方面的全景监视实际上削弱了父母的自我权利,加深了子代的主导权,凸显出家庭权力结构在数字世界的颠倒。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监控结构反映出风险意识之于关怀意识的优先,导致子代以限制性干预取代了更积极的技能反哺,忽视了父母作为数字用户的主观能动性。尽管冷冰冰的数据提供了远程关怀的工具,然而,这也导致孝道内涵的转变。传统的尊老与敬老理念逐渐被“技术帮扶”和“风险管控”的数字孝道模式所取代。子代在危机管控驱动下,通过技术手段,使家庭责任的履行变得更加依赖于远程监控与管理。最终形成了一种以社会融入为目的、以技术为基础、以风险管控为特征的空巢家庭媒介干预结构。这种结构虽然意在帮助父母融入数字社会,却无意间进一步固化父母的依赖性,形成一种隐性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 六、结论:未来子代媒介干预的平衡策略

在远程空巢家庭中,子代迫切希望年长亲代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然而,尽管媒介干预的实施旨在促进亲代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年长亲代的实际操作水平却并未显著提高。相反,在家庭风险管控的压力下,他们往往采取以限制为主的干预策略。在物质介入优先于精神支持的背景下,子代往往忽视了年长亲代的实际需求,使其成为单向可见的被动参与者。尽管智能手机为空

巢家庭建立了沟通桥梁,但同时也加剧了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年长亲代可以借助智能手机缓解孤独,但在子代主导的家庭媒介系统中,逐渐沦为被监控的对象,成为家庭关系中被动的情感依附者。

在父母对留守子女的媒介干预中,“媒介调适”是一种应对家庭危机的媒介策略。媒介调适指的是媒介在家长和留守子女的互动中,从被动的监管工具逐渐转义为连接双方、兼具沟通和监管功能的“代理者”。<sup>[17]</sup>这种转化旨在平衡家庭关系中的关爱与监管,为子女提供一个次级调适的空间。相比之下,子代对年长亲代的媒介干预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家庭照护的延伸。子代试图通过数字手段提供关爱和支持,但在关怀意识与控制意识的混合中,子代逐渐掌控了亲代的媒介行为,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这种不平等主要源于亲代作为被动接受者,依赖于子代的数字支持,而媒介调适在此情境下难以真正实现沟通与控制的平衡。这表明,数字赡养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无意间加深了亲子关系中的依赖性与权力失衡。

亲代作为年长者,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这表明在子代的媒介干预中应倡导“媒介互哺干预”。这一模式主张远距离空巢家庭中的子代干预从单向控制转为双向沟通与监督,以实现平衡的社会化过程。一方面,子代可以通过数字监控与反馈对亲代的媒介使用进行支持和引导;另一方面,亲代则通过学习与自我管理,积极提升自身媒介技能,并在必要时调适或抵制过度的干预。此外,亲代还可通过经验反哺,向子代传授自主学习的媒介技巧,彰显自身在媒介使用中的主体性。双向社会化的日常实践帮助他们在两代人之间主动维系情感纽带,调控个人意识和代际团结间的平衡。<sup>[37]</sup>

媒介互哺干预作为数字化策略,回应了空巢家庭的情感与秩序需求,也为“连屏不连心”提供了解决方案。传统的单向监控限制了亲代的数字参与,使其将智能手机视作亲子关系的维系工



具, 削弱了自我效能感。通过引入以“媒介互哺”为核心的双向互动模式, 子代能够借助远程技术支持提升亲代的媒介技能, 从而激发其使用意愿, 建立起对媒介的独立认知, 形成家庭内监督与反哺之间的动态平衡。在这一过程中, 子代通过隔空教学平衡物质与精神接入, 将风险预防与积极干预相结合, 不仅提升亲代的媒介操作能力, 也赋予其主动调节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 亲代在反哺中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 通过分享生活经验、传递媒介认知, 帮助子代建立真实的媒介理解。此双向社会化模式不仅促成了亲子间的深度交流, 也实现了家庭内部基于技术赋能的共同成长。

研究提出的双向社会化下的媒介互哺干预仅为理想设想。由于地理分割和情感隔离, 媒介干预在空巢家庭中往往演变为子代的控制性行为, 忽视了留守亲代对“身体回归”的核心需求。媒介干预虽缓解了亲代手机使用中的技术问题, 却未能化解家庭情感危机, 甚至加剧了情感空虚。亲代陷入手机依赖、数字诈骗, 反映出子代在情感陪伴和适度干预方面的不足。因此, 仅依赖限制性风险控制难以真正维持家庭秩序, 理想的干预应转向温和的风险防范, 虚拟陪伴应转向身体的真实在场, 以满足亲代的实际情感需求。

研究基于远程连接技术, 探讨空巢家庭中子代对亲代的媒介干预。研究聚焦数字鸿沟下的媒介沟通, 为理解数智化时代的空巢家庭提供了新视角。然而, 受限于研究对象, 研究主要关注县城和农村地区, 未涉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子代干预模式及城乡差异, 研究背景单一, 有待进一步拓展。

##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 2023-03.
- [3] 朱政德, 马爱芳. 从移动私藏到本地视联: 空巢老人的短视频沉迷问题与纾解路径 [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3 (5): 64-72.
- [4] 陈华. 媒介里的守望: 留守家庭的在线连接、异质互动与单向凝视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6): 29-39.
- [5] Schofield, C. L. (2012). *The parent app: Understanding families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Clark, L. S. (2011). 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 *Communication Theory*, 21 (4): 323-343.
- [7] Livingstone, S., Ólafsson, K., Helsper, E. J., Lupiáñez-Villanueva, F., Veltri, G. A. & Folkvord, F. (2017). Maximizing opportunities and minimizing risks for children online: The role of digital skills in emerging strategies of parent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 (1): 82-105.
- [8] 陈梦晖. 在媒介的边缘游走和融入——评《在乡村望世界: 中国乡村青少年媒介素养研究》 [J]. 新闻爱好者, 2017 (8): 112.
- [9] Zaman, B. & Mifsud, C. L. (2017). Young children's use of digital media and parental mediation. *Cyberpsychology*, 11 (3): Editorial page.
- [10] Livingstone, S. & Helsper, E. J. (2008).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 (4): 581-599.
- [11] Shin, W. & Huh, J. (2011). Parental mediation of teenagers' video game playing: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New Media & Society*, 13 (6): 945-962.
- [12] 郑春风. 乡村家庭、儿童手机实践与父母媒介干预困境——基于 GH 乡的民族志考察 [J]. 新闻记者, 2022 (2): 71-82.
- [13] 张箴. 数字时代城乡儿童父母的媒介干预比较研究——以鲁中地区 J 城和 Q 乡两地为例 [J]. 少年儿童研究, 2023 (3): 47-55.
- [14] 张煜麟. 社交媒体时代的亲职监督与家庭凝聚 [J]. 青年研究, 2015 (3): 48-57+95.
- [15] 陈青文. 新媒体儿童与忧虑的父母——上海儿童的新媒体使用与家长介入访谈报告 [J]. 新闻记者, 2019 (8): 15-25.
- [16] 曾秀芹, 战泓玮. 论亲子媒介教育的双向社会化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1): 50-58.
- [17] 刘王平, 郑欣. 手机争夺战: 智能设备监管与农村留守家庭秩序研究 [J]. 新闻记者, 2022 (8): 84-96.
- [18] James, B. D., Boyle, P. A. & Bennett, D. A. (2014).

- Correlates of susceptibility to scams in older adults without dementia. *Journal of Elder Abuse & Neglect*, 26 (2): 107-122.
- [19] 陈友华, 宗昊. 数字反哺: 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 98-109.
- [20] Li, B. & Chen, S. (2011). Aging,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housing in China. *Ageing International*, 36 (4): 463-474.
- [21] Liu, L. J. & Guo, Q. (2007). Loneliness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mpty nest elderly in the rural area of a mountainous county in China.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16 (8): 1275-1280.
- [22] Cotten, S. R., Anderson, W. A. & McCullough, B. M. (2013).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loneliness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among older adult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Retrieved June 20, 2024, from <http://www.jmir.org/2013/2/e39>
- [23] 张淑华, 徐婷婷. 乡村老年群体的“抖音社交”与“媒介养老”现象——以豫中某乡村为例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2): 129-137.
- [24] 周裕琼, 丁海琼.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20 (3): 6-31.
- [25] 周裕琼. 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 [J]. 新闻与写作, 2015 (12): 53-56.
- [26] Braithwaite, D. O., Suter, E. A. & Floyd, K. (2017). *Engaging theories in family communica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 [27] 周裕琼. 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 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 (2): 117-123.
- [28] 赵庆婷, 高昊. 农村地区老年人短视频使用的数字反哺现象研究——基于山西省中上达村的考察 [J]. 传媒观察, 2021 (9): 75-82.
- [29] 熊慧, 柴旭. “自主性”的再审视: 流动老人互联网代理使用机制及其影响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7): 41-49+79.
- [30] 洪杰文, 李欣. 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 [J]. 国际新闻界, 2019 (10): 50-74.
- [31] Hänninen, R., Taipale, S. & Korhonen, A. (2021). Refamilisation in the broadband society - the effects of ICTs on family solidarity in Finland.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7 (2): 161-177.
- [32] Hänninen, R., Taipale, S. & Luostari, R. (2021). Exploring heterogeneous ICT use among older adults: The warm experts' perspective. *New Media & Society*, 23 (6): 1584-1601.
- [33] 洪娜. 让走得慢的人有路可走 [N]. 解放日报, 2022-9-27.
- [34] 陈雅赛, 杨艳, 余淑妮. “啃老”与“孝道”: 青年与父母经济帮助关系中的数字反哺获得现象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5): 77-84.
- [35] 杨菊华. 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的消长: 数字时代的代际关系 [J]. 学术月刊, 2022 (11): 121-133.
- [36] 袁爱清, 孙强. 媒介赋权视野下社会底层群体的自我认知与形塑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12): 228-234.
- [37] 陈红梅, 罗鹏飞. 见“影”如面: 城市远距离家庭的子代家庭展示与数字亲密关系构建——基于手机拍照行为的考察 [J]. 未来传播, 2023 (6): 9-18+137-138.

[责任编辑: 谢薇娜]